

百年人生

徐光耀 著

# 昨夜西风凋碧树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百年人生

# 昨夜西风凋碧树

徐光耀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昨夜西风凋碧树 / 徐光耀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6.7

ISBN 978-7-5302-1560-9

I. ①昨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 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40365 号

昨夜西风凋碧树

ZUOYE XIFENG DIAO BISHU

徐光耀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 
邮 编 100120  
网 址 www.bph.com.cn  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 
电话 (010) 68423599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 
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 
印 张 8.25  
字 数 125 千字  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560-9  
定 价 28.00 元  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  
录

- 001 热土
- 019 老妹子
- 033 我的第一个未婚妻
- 043 杀人布告
- 051 忘不死的河
- 063 神游故校
- 079 春潮带雨
- 091 昨夜西风凋碧树  
——忆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
- 181 跳崖壮士
- 195 千萌大队
- 213 紧邻
- 229 两出大戏
- 245 后记

# 热土

## 一、傻子

我五六岁的时候，人们都管我叫“傻子”。

其实我有个很好听的乳名，可谁也不叫，我父亲，我姐姐，我的街坊邻居，连我的妹妹，都叫我“傻子”。奇怪的是，不论谁叫，我都答应，很习惯，很自然，一点儿也没有有什么不舒服。

终于有一次，姐姐很严厉地嘱咐说：“再有人叫你‘傻子’，不许答应了，你都快上学了！”

当天，走在街上就碰到有人叫，我便马上抗议：“我不叫傻子，我叫玉振。”人家就哈哈大笑，笑我的抗议简直是将黑作白，更显得傻气。

第一个不再叫我“傻子”的是姐姐。我四岁时失掉了母亲，把我拉扯大的，就是姐姐。

家很穷，父亲脾气暴，天天骂我们这几个孩子是“催命鬼”，是“债主”，是他“前世欠了账的冤家”！刚拿得动镰刀，他便让我去割草；刚提得动木筒，他便让我去打水。有一个早晨，我好不容易打满

半筐草，蹭着露水，拖着泥鞋，一进家门，父亲便骂：“半天就打了这么一丁点儿来？看你有脸端我那碗粥！”姐姐就赶忙拉我到一边，替我揉那压肿的肩膀，悄悄地，含着泪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姐姐一生都没有进过学校，可她支持我上学。父亲说：“上学？每天少打一筐草，还要拿学费，哪有那个闲钱？”姐姐说，每人每天省一口，她自己省两口，一年还省不出两块钱来？！——这样，我就上学了。因为上得不容易，学起来就不敢太撒懒，年终一考试，我闹个第二。姐姐得到了证明：这个弟弟不算太傻。

父亲也有好脾气的时候。冬天，夜很长，点不起灯油，吃过晚饭，睡觉吧，太早；不睡吧，枯坐愁城，又太没意思。孩子们小，大人过于威严，家常话也拉不起来。也是憋出来的法子，父亲自告奋勇：说笑话。这当然大受欢迎。于是夜复一夜地听笑话：《张三杀撅子》《傻小子拜年》《秃疙瘩跟红眼儿比本领》……笑话说完了，就说“大戏”：《庆顶珠（打渔杀家）》《牧羊圈》《捉放曹》《六月雪》……大戏也说完了，便转入成本大套的“古书”。我父亲认字不多，“学问”真不少，他说的“古书”是《呼延庆打擂》和《薛丁山征西》，到了小学三年级我才弄明白：他这些“成本大套”原来就是两本小人书——现在叫连环画，可那时它们竟成了我一家的大好精神食粮。

切莫小看了这些笑话、“大戏”和“古书”，它们打掉我不少傻气，并且很快使我扬眉吐气，而且出人头地了。

那年又逢春节，为了度过年关，父亲去杨柳青办了些年画来，经过自己的裱糊整理，赶集上店去卖。年画中有叫“八扇屏”和“小四

条”的，也是一套套的连环画，每套演一个故事，如《白蛇传》《杨家将》等等就是。那时我是三年级的小学生，已能根据画题和说明，当众宣讲画上的故事，这比做广告效用还大，生意好做多了。父亲虽然老嫌我宣讲得不积极，而乡亲们却把我高看不少，十岁大的孩子，能成套地“讲古”，在文化落后的乡村，岂非羊群中出了骆驼吗？

尽管父亲老对我不满，心里还是喜欢的。他又借些书来，灯油也舍得花钱买了。长夜漫漫，我就在灯下给全家念书听。什么《精忠岳传》《巧奇冤》《三侠剑》……一部接着一部，念是念得磕磕巴巴、连蒙带唬，可听的人却津津有味、如醉如痴。我自己也陶醉在那些豪侠故事中，日夜为岳飞、牛皋、胜英……担忧、狂喜、悲伤，当岳飞屈死风波亭时，一家人都热泪满腮，唏嘘不止，把个秦桧恨入骨髓！

念书入了迷，行动上便也有些魔怔，走起路来常常蹦跳翻腾，踢踢打打，大有“飞檐走壁”“闪转腾挪”之势。姐姐看在眼里，不但不以为怪，反要成全我的志向：她拿起菜刀，砍条木块，在灶火膛前打磨刮弄，做成一支飞镖，还用红布缀上个穗头，使我在几个月中飞来掷去，一直做着“飞镖黄三太”。那股凛凛逼人的豪气，至今想来仍然令人神往。

姐姐天天做针线，稍有空闲，也绣花，我的鞋上就多次出现过鲜活的玫瑰或芙蓉，等到姐姐听书入迷之后，就改画画儿了。“大破莲花湖”的男英雄们自不必说，花木兰、穆桂英、樊梨花……更是她笔下的“骄子”，她们一个个擎旗贯甲，跃马挺枪，把一派勃勃英气，化作纸上云烟。



最令我惊异的是：我在灯下念书，她在灯下缝衣，两颗头争着一盏灯，我念个不停，她缝个不停，有时“滋滋”一阵响，焦味弥漫，一缕头发烧焦了，她却还没有发觉。就这样，一冬过去，她竟然也能把书读懂了。她说，她是跟着我的声音，盯着我书上的字，一行一行跟下去，跟会了的。可我从来没有觉到她停下过针线啊！——比起她的聪明，我是多么笨啊！令人愤愤不平的是：为什么能送我上学而不能送她上学呢？凭什么哟！……

然而，也许姐姐比我更傻，她干过很多傻事：七七事变第二年，八路军刚刚在我的家乡出现，遍地还流传着“好人不当兵”的古训呢，她就打破了父亲的固执，把我——她唯一的弟弟，送去参军了。此后，烽烟遍地，战火纷飞，因为五年多得不到我的信息，她又跑去求神许愿：甘愿一辈子不吃荤，以换取能见弟弟一面为满足。1958年，我被打成了右派，她几十个昼夜不合眼，最后得出结论说：“中国一定是出了奸臣！”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在“四人帮”淫威极盛时，她几次私下向我肯定：“江青是个特务！”1976年，唐山大地震，叠压着的预制板压住她的胸口，弥留之际，她还发出判断说：“苏修亡我之心不死，他们打来了原子弹！……”就在拖着个赤条条耗光了精力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她也显得何等天真和傻气啊！

## 二、当兵

尽管在小学时便养成一点尚武精神，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后来会

当兵。

我从小见过的大兵，都是可怕的。他们进村就抢劫、打人、发横、污辱妇女……一说“大兵来了”，老百姓就急忙逃遁躲藏，避之如匪贼，“好人不当兵”的话，已流传很久很久了。

七七卢沟桥的炮声，把这些大兵——连同附着于他们的官僚、党棍、警察等等，一概轰跑了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，使大片国土轻轻沦丧，撇得老百姓两眼望天，六神无主。土匪、恶霸、流氓、豪绅……乘机而起，到处招兵买马，争立旗号，画地为王，于是“主任遍天下，司令赛牛毛”，时势大乱，人们像站在一块滚烫的热土上，谁来收拾这个残破的局面啊？

“中国人要当亡国奴了！”成了一句流行的话。

什么是亡国奴？从传说中我得到一个具体形象：据说日本人到来之后，他要骑马，就先叫一个中国人跪在地上，然后蹬着他的脊背上马。我父亲在天津当过小工，亲眼见过洋人的辖治。他说，中国人在他们眼里，连一条狗都不如的！我在小学曾念过关于“九一八”的课文，说是“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，恭恭敬敬让出了北大营”，描写那凄惨之状，着实吓人。我们都又恨又气，天天在地上画些小人，写上“小日本”三字，拿起砖头来狠砸。我常常想，难道就没有岳飞吗？真要让人家蹬着脊背上马吗？

突然，开来了八路军。他们走着整齐的步伐，唱着雄壮的军歌，不打也不骂，自动跟老百姓要粗粮吃，进了院子，抓笤帚扫地，拿扁担挑水，见了老头叫“大伯”，见了年轻妇女就把眼睛掉往一边去，

不笑不说话，出来进去尽仰着头唱歌，住了好几天，看不出哪个是官儿来。这支军队真新鲜得奇怪呀！

见识广的人悄悄说：“八路军就是红军，是共产党！多年跟老蒋不和，抓住就杀头的……”

老实说，共产党是好是坏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，本没有成见，大人们说得那么奇奥，倒更逗起我的好奇心，便整天跟着这军队去瞧稀罕，看他们演操、上课，跟他们一起学歌，围着那长长的队列瞎跑。有一次，一连人围个大圈，做“丢手绢”游戏，玩着玩着，有个挺清秀的战士被“抓”住了，就罚他站到当中去唱歌。他红着脸唱“工农兵学商，一齐来救亡”，唱到最后一句，右手往帽檐上一举，给大家敬个“罗圈礼”，敬得又谦恭，又质朴，配上羞答答的笑容，姿态十分生动，看来美极了。

回到家，我把这个见闻兴致勃勃地告诉了姐姐，而且举手在额，把那战士的“罗圈礼”表演了一番。不想姐姐也大为感动，说这真像个“老实巴交的庄稼主儿”，笑着要我再做一遍，我就很得意地又做了一遍。

巧得很，过不几天，八路军一个班住到我家来了，而那个被罚唱歌的战士恰在里面。我高兴得不得了，故友重逢似的立即缠着他教我唱歌，给我看枪，成天厮混。追问他的姓名家世。他叫王发启，安平县南郝村人，果然是个“庄稼主儿”。那时我家喂着一头小毛驴，王发启便在操前课后，牵它去村边放牧，我跟着又玩又跳，形影不离，这样七八天，我们竟亲密到无法表达各自的感情，就学着“桃园三结

义”，提出要“结拜”了。

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历来反对封建，“拜盟”是封建帮派活动，按理是不允许的；但王发启所在的部队是一支新军，政治工作还很薄弱，纪律约束也不太严，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，我居然同这位十七岁的“盟兄”对天磕头，发誓要“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”了。父亲一点儿也没料到这件事的严重后果，他还发个狠心，给我们包了一顿饺子吃呢。

“拜盟”第三天，一道命令下来，八路军开拔走了。走多远？到哪里去？盟兄一概不知。兵随将令草随风，我毫无办法，流着泪跟了王发启，送他到村外，看着那长龙似的队伍渐去渐远，终于在茫茫的天际上消失。于是出生以来第一次感到，我的灵魂没有了，它被八路军带走了，同王发启跑往天际以外的什么地方去了……

我打草无力，吃饭不香。孤单单只觉心烦意乱，无靠无依。八路军招兵的消息到处飞传，日本鬼子深入国土的灾难日重一日，乌鸦在头上乱飞，哪里是立足之地啊？终于，我抖抖胆量，向父亲说：“我要去当兵……”

父亲吓了一跳！前面说过，他是个很暴烈的人，从没有哪个孩子敢向他提一点非分的要求，更不要说顶撞。我说出“要去当兵”的话来，当然大出他的意料。我真担心他会揍我一顿。

父亲在村中也一向以心狠闻名，他年轻时，脚趾上长过一个疔疮，疼得鞋也不能穿，大大妨碍他干活儿，不得已，去集上找一位“先生”医治，“先生”要大洋一元。他问：“流血不流血？”“先生”说：

“流。”再问：“疼不疼？”说：“疼。”他便转身回家，磨快刀凿，一斧子下去，连脚趾带疔疮一齐剁了下来……他中年丧妻，独自拉扯四个孩子，“穷死不借账，饿死不做贼”，衣食全靠两手抓挠。有一年，他得了重病，吃不起药，便生嚼一瓣子大蒜，硬扛过来了。他外硬内也硬，对儿女们很少怜恤，平常连个笑脸也见不到。这些当然是穷逼的，可也不是不带一点天性。拿他的森严跟八路军的和乐空气一比，当兵就成了我向往的天堂，何况还有当亡国奴的威胁呢！

我总是想，如果妈妈还活着，要当兵恐怕就难了，家境再穷，母亲的抚爱也会给儿子以无限温暖；而温暖的窝窝，谁肯遽然割舍？可惜，我妈妈去世太早，我早已忆不起她的容颜来了，依稀留在脑中的只有两件很模糊的印象：一件，妈妈生了小妹妹，正抱着哺乳，我却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扑进怀去抢奶头吮，被妈妈宽容地揽在腋下，抚摩一阵，便推我一边玩儿去了。另一件却悲惨得多，正吃中饭时候，她忽被父亲一顿暴打，直挺挺倒在地上，好大一阵工夫，不说也不动。是有个邻居进来，才把她搀扶上炕，可她依然不说话，不流泪，只消片刻的喘息，便弯侧着身子，刷锅去了。直到今天，每逢想到这个挺在地上、不说不动的形象，便觉得可怜而又奇怪：她为什么那样忍受？又为什么那样温顺？但又觉得，如果我是向她要求去当兵的，她只消轻轻说一声“不要去”，我便会烟消云散，安静下来，而绝不会像对父亲那样，一连哭上七天。可见家长制的弊害，连自己的儿子都会产生离心倾向的，而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，却具有磁铁般的吸力，抵得上母爱的力量。

我用消极对抗——连哭七天的手段，把父亲的狠心磨软了。他知道姐姐最爱我，便去找姐姐商量。姐姐的结论，是当时农村妇女难得做出的，她说：“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，待在家里，也无非当亡国奴。八路军看起来很正气，跟了去闯荡闯荡，不一定就把孩子糟蹋了。就是真出了岔子，为抗日，精忠报国，名声儿也是香的！”

父亲辗转反侧，一夜不曾合眼。第二天，便找了私塾老师韩先生（他曾去投八路的，因年纪大，没被录取），请他做引荐，带我到笕岗镇去当兵。住笕岗的八路军穿灰布军装，脚蹬草鞋，说话哇里哇啦，人称“蛮子队”，一个连有五挺机关枪，这在当时是十分显赫的强大装备。我其实等于闭着眼睛瞎碰，碰上的却是正正规规的八路军，是由老红军改编的一二〇师三五九旅特务营。这开脚第一步，我真算有点运气哩！

### 三、大家庭

我参加的是特务营第一连。连部驻笕岗大街路北的一家院子里。院子很深，我随着韩先生一步步往里走，心上禁不住突突直跳。里头没有王发启，我谁也不认识，真不知要把命运交给一群什么人！才只十三岁，何苦背井离乡，去当什么兵呢？我简直就要懊悔了……

引着我勇往迈进的是韩先生。他不但教过我《论语》，还是我父亲最信服的“土圣人”。他今日负着给我引路的责任，自觉一种特别的神圣感。这样，我们终于进了连部：两间相连的大屋子，地上站着

四五个八路军的兵。韩先生一手提着长衫的大襟，一手伸出去指着，蛮有风度地给我介绍：“这位是曹连长——鞠躬！”我赶忙并拢双腿，弯下腰去，引得细瘦而年轻的曹连长哈哈大笑。韩先生又指着桌子后面一位微胖的青年：“这是陈师爷——鞠躬。”我忙又一弯腰，这位“陈师爷”要来阻止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便朝后一仰，笑得险些跌在炕上。韩先生转个身，看见墙角里另一位青年，又指着说：“这位是卫师爷……”我瞧这“卫师爷”，稚眉嫩眼，满脸孩子气，实在比我大不了几岁，但既是“师爷”，怎敢不敬礼？便又一躬下去。不想“卫师爷”满脸飞红，“啥呀啥呀！”一阵叫，忽地一蹿逃出屋子去了。随后是填战士登记表，上花名册，分配我当勤务员。第二天，发了一套又肥又大的军装，大得能装下我这样两个人。大家嘻嘻哈哈地围着我乱嚷：“可以可以……”我还有什么说的呢？

就这样，我进入了一个很新鲜的大家庭。

有些文章一写到这种场合，总是说，这个大家庭如何如何热诚友爱，如何一下子就给人带来了快乐和温暖，我可没有这种感觉。第一，我很紧张，当勤务员是伺候连首长的，我摸不透连长会不会真的不打人。平常不打人，私下也不打吗？万一做错了事，会不会拳脚相加？第二，全连的人没有我一个老乡，江西人、湖南人、福建人、贵州人……净是南方蛮子，最近的是山西人，说起话来叽里呱啦，把“吃饭”叫作“卡饭”。有一回，连长叫我去买“牌子”，我问什么牌子，问了半天，越问越糊涂，还是“陈师爷”过来，连说带比画，才明白是叫买筷子。总之，我简直没法跟人交流思想感情，成了孤儿。

第三，尤其可怕的，是改天下午，营里召开军民大会，把一个人枪毙了！这人恰恰是我的老乡——只隔三里路的程岗人。我正自惊魂未定，又来了第四件：命令下来，明天出发——连队要“移防”了。

“令下如山倒！”第二天一早，连队果然排成行列，真的出发了。我夹在这长长的队列之间，蜿蜒着爬出笄岗，爬过原野，接着就爬过了大清河……我站在大清河堤上回望，啊，离家已经二十多里了，我从小没有跑出这么远过，这次真的要告别这故乡故土了！我酸着鼻子，想起了姐姐，也想起了父亲，觉得他们正登在房顶上，朝大清河张望，在呼唤我回去！我很想回应他们，可嗓子里像是堵着什么东西，就是回应不出，只好收回了眼睛——八年之后我才晓得：这一天，姐姐曾坐着驴车，追来看我，追了十多里，没有追到，是抱着诀别的凄凉心情回家的。

连队在大清河上船，几只大“对槽”排开，一直航行到郑州。路上，通过白洋淀，大水滔滔，一片汪洋，我从没有在如此浩渺的水面上泛过舟，不禁东瞧西看，惊异着这水光接天的广袤天地。“陈师爷”怕我晕船，告诫我不要看近处，要看前方，看远处，看天边。远处蓝天白云，水面上浮着一个个绿色的村庄，恰像一座座小岛，想象中似乎已进入“莲花湖”“落马湖”了……

“天下大庙数郑州”，我从书上早就知道这个地方，据说，郑州有三景：铁道、铜井、无影庙。可惜，宿营时已是红日压山，我尽管心颇好奇，也必须打扫庭院，摘门板，搭睡铺，同连部的人一起，整理内务。在跟“卫师爷”共移八仙桌子的时候，我因个儿太小，不能



抬桌离地，只得踮起脚跟半拖着走。“卫师爷”就用山西话嘲笑我，可嘲笑了些什么，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。

以后，天天行军，一路向西南而行，到深泽城关才扎住。中间有一天走了九十多里，最后十里，实在走不动了，战士们便叫我抓住马尾巴，让它拖着走。拖着走，仍然需要迈腿，可腿已经又酸又肿，迈不动了，真想哭。最后，还是挤掉旁人，骑了上去；骑上去当然舒服，可到了目的地，下不来了，两腿木胀胀的硬是动弹不得，只好由人抱了下来。然而，“力气是井泉水”，睡了一夜，第二天照旧走七十里。现在，这么九十里、七十里地一说，很是轻易，可当时真是要咬牙再咬牙的啊。

这段行军过后，我才真正成了“大家庭”的人。同全连的人逐渐搞熟了，大家都喊我“小鬼”，夸这“小鬼”不错，没有挨过骂，也没有挨过打。所谓“陈师爷”，原来就是文书，成天填填表格，开通行证，打个行军报告什么的，干着一揽子笔墨差事。而“卫师爷”是卫生员，根本不姓卫，姓刘，当时十七岁，喜欢嬉闹而脸皮甚薄，处得熟惯了，一叫他“卫师爷”，他就追着打我，把“师爷”二字明显地当作污辱。不久，又来个文化教员，办起了救亡室，找个大房间，张挂起标语彩旗，日日教战士们唱歌、识字，还隔三岔五地出墙报，搞游艺，救亡室成了最活跃、最逗人喜爱的地方。

人，也是熟起来才有意思。有个司号员，外号“土狗子”，说话最难懂，福建人，大家说他的全家都叫国民党杀光了，可他从来不哭，除了死死掌管着全连的时间——准时吹号以外，最大的嗜好是下